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部落战争在现代空军社会中的表现

Tribal Warfare: The Society of Modern Airmen

马克·K·威尔斯博士，美国空军上校（Col Mark K. Wells, PhD, USAF）

在十七到十九世纪期间，北美大陆上美洲土著之间经常爆发部落战争且不乏激烈。冲突所争，一为土地，二为资源，通常规模小但频发，久而久之仍形成巨大破坏；除此之外，冲突各方极其崇尚声望与地位。部落之间地位高低尊卑对他们而言举足轻重。有时候，所谓突袭纯粹就是手舞足蹈一番，意在嘲弄奚落对手，包括著名的“点击棒”做法，即突然用手或一根特殊的木棍点触或击打对手，点到为止。简言之，武士个人和部落都追求在更大印第安人群体中的等级和地位。[1]

现代空军虽是国家更大的国防体系的一部分，但若做比较，把空军中的官兵比作各个部落中的成员，也并非扯得太远。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每个部落的核心身份，又相应地基于我们日常主要做什么。最简而言之，飞行员驾驶飞机，领航员和武器系统控制官操作装备，维修保养官兵修理飞机，人事官管理人力资源，导弹官兵训练发射导弹，情报官做分析和预测，诸如此类。美国空军仅就军官分类而言，目前列出了 120 多个岗位专业代码。在空军，犹如在印第安人社会——乃至任何等级化机构——地位和声望对成员资格和成功都很重要。其之表现，远远不只是我们大家佩戴的普通且容易识别的军衔标志，同样显眼和同等重要的，还有表明我们资格的胸章；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佩戴的最重要的、在和平时期或战争中赢得的、象征功绩的勋带或奖章。

把这些饰物结合起来，就确立了一个军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地位，且比平民界更易识别其在这个军人等级制度中的级别。而且，知识、技能、语言等，进一步把部落或次级群体互相区分开来，各自建立其自己的群体认同感。[2] 几乎从有组织的冲突开始之时，军事组织就反映出一种类似金字塔的结构，其中各种不同阶层的成员占据着独特而明确的地位。用生物俗语表示，有时把这种现象称作“啄序”或“食物链”。尽管在这些部落或次级群体内会发生一些上下移动，但通常认为，跨越部落尊卑顺序界线的地位重大上移要困难得多。

远从荷马古希腊时代开始，甚至从世界其他地方更早的时代开始，出于五花八门的历史原因，世界上各种军事组织中的最高阶层，长久以来总是由真正的“战斗者”所占据——当然不无道理。不妨列举一段经典的、很好理解的定义：战斗就是在械斗或交战中厮杀、争夺或斗争。而战斗者就是冒死与敌接战的人。自有飞机以来，在空中与敌战斗的飞行员就被视为这个精英群体的成员。飞机和飞行当时都是新奇事物，飞行员常常被看作超胆豪侠。许多人认为，只有特殊类型的男子才敢无惧此危——尤其是战斗飞行。[3] 这种光辉形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大众眼里越发升华到夸张。时势造崇拜，飞行员几乎被视为“超人”，既有钢铁般的意志，又有超群的体力和智力。总之，由于明显的原因，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士形象，首先

属于飞行员——或者更广义地说“飞行”空军战士。也许，正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政府的宣传努力，把飞行员奉为“英雄”,结果把飞行员送上了英雄金字塔的顶部。

在许多局外人看来，飞行员目前似乎过着备受宠爱的生活，与其他军种的战友们相比，他们享受着极不成比例的地位、薪水和特权。[4] 当然，任何空军部队向来都承认飞行员之外的其他战士，即非飞行战士，也是作战行动根本不可或缺的人员。航空的核心是技术，其精华取自尖端科学、技术和应用所构成的庞大基础设施。尤其是如今，假如没有成千上万个工时和数十亿美元的科技与工业投资，就无人能飞上天或开展任何形式的空中行动。而且，2010 年收集的数据表明，在美国空军，每位飞行员的身后，都有至少 23 名非飞行战士和军官在提供支持。[5] 有鉴于此，不妨可以说，空军和其他军种相比，首与尾的比例差，必然最大。

可是长久以来，无论是在大众想象之中还是在空军内部，总是重首而轻尾。直到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前 90 年的军事演进，从未扰乱空军等级观的井然次序。飞行员始终高高在上，军种内几乎尽人皆知。而在飞行员和更大的航空飞行等级界，局内人亦熟知其中的复杂性。再回头接着谈我们对战斗者的认识,即武装部队中的战斗者——甚至潜在的战斗者——通常会比非战斗者获取更多的认可，我们承认，战斗机飞行员在大多数空军部队都享有最高地位。其他类别的飞行者(比如轰炸机飞行员、运输机飞行员、或训练部的飞行教官）作为一个次级群体，地位又稍低一等，但仍是等级金字塔顶部的精英团体成员。对这个地位的最简单的衡量，就是看晋衔统计数据和升任更高级职务的比例。[6]

二战刚结束之后和冷战期间，美国空军轰炸机飞行员的地位毫无疑问获得上升，从总体方向上看，至少在空军的战略、政策和采办领域有所提升。这些军官——主要是战略空军司令部造就的飞行员——形成莫里斯·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所称的“精英核”的一部分，不过随着国际安全形势要求的变化，飞机的发展和部署也发生调整，于是他们又让位于另一个群体。[7] 可携带核武器的大型轰炸机在扮演了一段不长时间的主角之后，其在诸如越南战争等冲突中的作用开始缩小，因为这类战争更需要空中平台对地面行动的快速响应支援。轰炸机飞行员现在虽然将美国空军等级中的正位让给了战斗机飞行员，但继续是飞行精英界的成员，并继续把持着空军的其他各种非正位权势。毕竟，轰炸机飞行员仍面临着随时出入凶险环境的“潜在”可能，这一事实，连同以往战争造就的潇洒形象和英勇传奇，足使他们继续守住优越地位。

从以上思考中，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这就是，当前作战的性质、战场的大小及规模、或者说军事本身以及空军的最本质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是否必须重新定义“战斗者”？这样做是否会打乱空军等级观中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次序？由于全世界的空军部队都在缩小规模、越来越趋同化和文职化——更重要的是——空军的使命正与其传统使命渐行渐离，这一切使塑造新理解成为必要。[8] 很难想象，传统的军事手段——所谓的“火力与钢铁”动能打击手段——会有一天销声匿迹。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对维和行动、国家建设、人道救援等的关注越来越重要。这些事实使暴力组织者、社会公民、空军官兵、战斗者、军事承包商等之间的区别趋于模糊。事实上，

这一切也推动了空军部队中直接战斗和战斗支援作用的关系发生变化。我们当然还必须看到平叛作战、反恐作战和打击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所呈现出的多重复杂性。简言之，食物链发生了动荡！

以美军越来越频繁使用的一项技术为例，空军称其为无人飞机系统 UAS，其他各方称其为无人驾驶飞行器 UAV。虽有此官名，国际印刷和电视媒体习惯称之为“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空军曾极力将这种平台统一命名为遥驾飞机（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但始终未能如愿。明眼人——或者飞行精英俱乐部的成员——都会注意到在为探索此第三维度空间的任何机器命名时，使用“pilot”即“驾驶”一词的意义所在。撇开名称之争，有一点看来明确无疑：无人机在未来空中行动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若非支配地位的——作用。最起码就数量而论，它们目前占每年所采购的系统中的一大部分。

这种作用的扩大，同样发生在太空操作系统领域中，无人系统越来越广泛用于增强通信能力和情报监视侦察的链接。积极探索太空需要发现、挑选、教育和训练一代全新的空军战士。这个群体已经逐渐但稳步成为空军多层次等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也可以说，他们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还有待完全认可。

类似的等级观问题，也困扰着“网络武士”——那些受命而投身于不断扩充的网络空间的战士。虽然我们可以说，开发利用电磁环境长久以来都是空中行动和空中力量的一部分，但计算机网空和人工智能对当代战争的潜在影响极其深远。这种新作战方式不是单纯依靠对目标的物理摧毁——歼灭或消耗——而是致力于产生预想效果。非杀伤性手段不仅可以用来辅助传统的动能武器和手段，甚至可能将其淘汰取而代之，而同样迫使敌人改变行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动能武器的影响，这些武器包括微波、网络袭击、电脑黑客入侵、定向能束、射频攻击、声学武器，等等。[9]

我辈思也有垠，难以想象网络、无人机、乃至更新的技术对当代作战行动的深远影响。一种结果是战斗空间几乎无限扩大。空中力量也不断扩展，已超越陆地、海洋和天空而延伸进入太空和网空。而且，空天网三域浑然一体，无间运作，对美国空军“飞行、战斗、制胜”以保障国家安全而言，已须臾缺一不可。[10] 其结果，空军不可能延续一贯的体制做法，继续依靠仅由直接参战的英雄组成的精英小团队来领导部队。技术专家、无人机操作员、情报分析员和卫星操作员——即便身在千里之外毫无战场伤死之虞——正对空中作战的成功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对空军的社会文化也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循此思路，世界各国的空军，将不再需要纯粹依靠有人驾驶飞机来执行战斗任务，那么空军的领导团队也必须顺势而为，思考如何改变部队的组成。就在不久之前，开始流行“武士”之说，谓其英雄虎胆乃心理状态，非其实际经历。今天，欲入武士之林，空军的一些战士不再需要拼杀或踏入生死战场。不同角色不同作用的混杂趋同，已经导致空军等级观发生重大而易见的变化。摩擦势成必然。

我们这些继续服役的军人，每天都看到这种不和谐。几十年来，美国空军中普遍的感觉是，飞行员争得了大部分晋衔机会，并在任职中得到特殊照顾。根据组织理论，个人不会轻易放弃这种特权地位。随着空军中各次级群体之间的区别减少，有人相信，一

场想保住社会优越地位（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的争夺战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反应总是进一步模糊群体之间最明显的区别。通过让更多人员群体佩戴飞行部队的显眼标记，空军所有成员也许保持更强烈的团队感。进一步，高级领导人刻意地大幅度增加专业评分和专业标志的数量，以提高士气。还有，有些特殊的职业领域获得直接关注而得到额外晋升考虑，从而改进公平程度。[11]

但这些努力并不总能成功，也不会受到普遍赞同。任何官方和规制上的努力，就组织文化的变化而言，常常举步维艰，通常必须克服一大堆基于历史、传统、人类行为不确定因素等的复杂态度。无论空军领导人出于什么目的而按照当代空战现实重新排列传统座次或调整人员序列，阻力和冲突都会继续存在。“部落”和亚文化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多年,甚或几十年。更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由新生技术引起的张力本身，实际上对这个金字塔等级制有“好处”。无需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我们也能知道，组织内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其实有助于人人积极进取,更愿意奋争求变——或适变。尽管有冲突，最好的想法最终总会胜出。回想二十世纪中的前几十年，陆军骑兵也曾极力抵抗机械化的到来，然而结果不言而喻。[12]

在这方面，对无人机飞行员的心路历程做一番审视，或许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媒体过于乐观地宣称：无人机正迅速改变空军的“飞行骑士”崇拜文化，佩带标志飞行员身份的鹰翼臂章的新晋无人机操作员正在数量上超过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13] 数量上的确开始超过，但是，至少其中有一些人还梦想着坐入传统飞机的驾驶舱，他们极不情愿放弃真实飞行的机会，而待在远离真实飞行作战线和喷气战机轰鸣的地面小拖车厢中，搬弄计算机屏幕上的飞行操纵杆。[14] 非飞行者们很难体会到驾驶飞机的惊险刺激和情感满足。凌空飞行甚至是一种浪漫，可明显溯其源于神话，例如希腊神话中造双翅凌空逃脱的代达罗斯（Daedalus)。

当前空军文化和等级制中的不安定气氛，还有其他种种表现。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最近发生考核舞弊事件，九十多名导弹发射军官在月度专业熟练程度考核中作弊，导致了十名指挥官被解职。发生这个舞弊事件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这些军官认为自己的工作在专业上吃力不讨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长久以来，这个绝对至关重要的使命被置之不理、边缘化、忽视，或者用生物俗语表示，就是“被排挤到食物链的最下端，”落到无关紧要的境地。[15] 不妨注意一下，空军中新晋少尉衔的年轻军官中，自愿加入导弹发射部队者较其他专业为低。

以上讨论有何启示？西方军事发展已经历许多世纪，人类一向崇拜威武勇敢视死如归和胜者风范，荷马史诗塑造的武士情结由来已久，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总之，从理智层次而言,空军领导应该——也确有理由——致力于调整部队中传统的部落等级制，重排各种专业的轻重次序；但是我恐怕这种努力终究难以完全成功。规制可改，而人类的情感和反应力难变。网络武士，无人机操作员、电脑专家、卫星控制员等等，几乎肯定将决定未来任何重大冲突的结局。但是就像两个世纪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那样，人类的感情和思维方式将继续支配空军人事体制中的等级观。自古而今，如果要寻找一些共同主题的话，大抵都很难忽视神话和某种浪漫观的影响，亦即必须考虑各个群体或次级群体对全体福祉的贡献大小。当代的我们无论

怎样扩充对“武士”的定义，我们的集体意识似乎都回归到远古交战中的人类。在美国，如同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祖辈一样，我们的空军从诞生初期，就已经按部落排出了正副高低顺序。这种过程在继续，抑或步伐更快些而已;但无论成就何种排序,只能保持一时，一如任何技术不会永远领先，但终在推动整体的进步。♣

注释:

1. Douglas B. Bamforth,“Indigenous People, Indigenous Violence: Precontact Warfare on the North American Great Plains”[土著民族，土著暴力：北美大平原上本地人接触外来文化之前的战争], Man 29, no. 1 (March 1994): 第 95-115 页。
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战士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和政治],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7-18.
3. Picture sec. I,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图画版 I 部], 6 November 1910.
4. Max Hastings, Bomber Command [轰炸机司令部], (London: Pan Books, 1981), 254-56.
5. “2013 USAF Almanac”[美国空军 2013 年鉴], Air Force Magazine, 96, no. 5 (May 2013): 37-38.
6. 关于军队等级制和赋予作战部队的价值，参见 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职业军人：一幅社会与政治肖像],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54-75.
7. Michael R. Worden, Rise of the Fighter Generals: The Problem of Air Force Leadership [战斗机将军的兴起：空军领导层的问题], 1945-1982 (Maxwell AFB, AL: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5-38; 另参看注 6 中 Janowitz, Professional Soldier [职业军人], 150-51.
8. Charles C. Moskos, David R. Segal, and John Allen Williams, eds.,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 [后现代军事：冷战后的武装部队],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7.
9. Maj David W. Pendall, USA,“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nd the Exercise of National Power”[效基作战与国家力量的行使], Military Review, 84,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4): 20-31.
10. Rebecca Grant,“The Dogs of Web War”[网战之狗], Air Force Magazine 91, no. 1 (January 2008): 23-27.
11. Lt Col Lynne E. Vermillion,“Understanding the Air Force Culture”[了解空军文化], research report (Maxwell AFB, AL: Air War College, 1996), 50-52; 另参看 Air Force Instruction 36-2903, Dress and Personal Appearance of Air Force Personnel [空军指令 36-2903：空军人员的装束和仪表], January 2014.
12. Walter Pincus,“Study: Air Force Pilot Culture Detrimental to Future Military Preparedness”[关于空军飞行员文化有害未来军事准备的研究], Washington Post, 5 November 2013.
13. Jim Michaels,“Drones Change 'Top Gun' Culture of Air Force”[无人机改变空军的“空中骑士”崇拜文化], USA Today, 1 December 2012.
14. Dan Parsons,“Debate Continues over Role of Simulators in UAS Pilot Training”[有关模拟器对无人机飞行员训练作用的讨论在继续], National Defense, 98, no. 721 (December 2013): 38-40.
15. Brian Everstine,“Commanders Fired, Changes Coming for Nuclear Missile Officers”[指挥官被解职，核导弹军官队伍改革在即], Air Force Times, 28 March 2014.

马克·K·威尔斯博士，美国空军上校（Col Mark K. Wells, PhD, USAF），毕业于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德州理工大学文科硕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博士，现任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历史系终身教授暨主任，领导该系 31 名教职员工每年向超过 3,000 名军校生讲授 40 余门各类历史课程。他曾担任第 92 空中加油中队 KC-135 飞机指挥官、T-37 飞行教官、飞行员教官训练部飞行指挥官，及驻欧盟军最高司令官军事助理。他目前仍在第 557 飞行训练中队担任现役飞行教官。上校曾在多种期刊发表过文章，他的第一本书《勇敢与空战：二战中联盟空军战士经验》(Frank Cass, 1995 年）获得军事历史学会 1997 年杰出图书奖，并两度列入空军参谋长推荐阅读书目。他是指挥飞行员，拥有超过 3,200 小时飞行 KC-135、T-37、T-3、T-41、T-52 和 T-53 的经验。上校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和空军指挥参谋学院，也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